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周旭¹

(1.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党校,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该思想系统继承并创新性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生态智慧,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催发了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当代觉醒。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构建了包含价值理念、系统观念、制度保障和全球视野的完整理论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了当代中国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哈尔滨市党校系统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HD01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99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极端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探寻一条可持续的文明发展道路,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生态问题也逐步凸显,自然资源逐渐紧缩。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是当务之急。时代的课题,实践的呼唤,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引。202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一百年来奋斗经验,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并首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成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是,这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科学思想,蕴含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然而,这些传统的生态理念在历史上多以朴素、直观的形式呈现,如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突出贡献也正在于它完成了对这生态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并非简单地复古或照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与世界的发展的实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提炼、升华和再造,赋予其崭新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实现了从传统哲学思辨到现代科学理论、从零散观点到系统体系、从理想愿景到实践指南的历史性飞跃。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这一“双创”过程,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路径,实现引领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愿景目标。

一、源与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思想,无疑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镜鉴。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诞生并发展于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是处于较低生产力水平下的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一种原始反映,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性和片面性。因此,

作者简介:周旭(199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硕士,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党校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蕴含着生态哲学的感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道德性的劝诫和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性总结，并非是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生态科学理论。其内在局限性亦不容忽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和被动顺应色彩，多局限于思想层面的道德规劝，不凸显实践性功能，缺乏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对于客观发展规律也缺乏主动性和科学认识，在强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下，这些朴素意识往往显得脆弱。因此，传统生态智慧虽然指明了方向，却难以完整提供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全套方案。它如同珍贵的“种子”，需要适宜的现代“土壤”才能生长为参天大树。这份“唤醒”古老智慧并赋予其当代生命的伟大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卓越创造之中。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它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而非对立与征服。儒家从道德伦理角度阐释“天人合一”。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体现对自然生命的仁爱和取物有节的节制观。孟子明确提出“仁民爱物”思想，将对人的仁爱扩展至对万物的关爱，并倡导“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揭示了遵循自然规律方能实现永续发展的朴素哲学。《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更是将“中和”视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法则。

道家则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将“天人合一”思想推向极致。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将“自然”视为宇宙的最高法则和终极价值。庄子倡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以平等、齐一的观点看待万物。关于自然规律，道家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6]，即要顺应自然的本性和规律行事，反对人为地干预和破坏自然秩序。除此之外，佛家作为外来文化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其“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核心观念与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依正不二”的深刻认知，认为众生（正报）与其所依存的环境（依报）是一体不二、休戚与共的关系。

（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观

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系中，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还衍生出一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这套准则深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永续发展的朴素追求。儒家思想为这一实践观提供了深厚的伦理基础。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著名论述，绝非简单的生产技巧指南，而是把对自然资源运用的思考纳入“王道仁政”的治理框架中，逐步上升为政治层面应遵循的道德律令。孟子的理念核心在于“时”，即遵循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和季节节律，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掠夺式的开发模式。荀子进一步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阐述“节用”的重要性，他在《天论》中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强调只有将发展农业生产（强本）与节约消费（节用）相结合，国家才能抵御自然风险进而保持富裕。这种“节流”与“开源”并重的思想，展现了古人超越单纯节俭、谋求动态平衡的高远智慧。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观并未止步于思想家的书斋里，而是深刻地渗透到国家治理、经济政策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持续特征的实践思想和制度安排。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亦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如都江堰水利工程遵循“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原则，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历经千年仍福泽一方，是“取之有度”的工程典范。在经济思想方面，反对奢侈浪费、倡导俭朴节用一直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历代王朝大多在建国初期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让被过度征用的自然系统和民间社会得以恢复生机。这些从哲学思考到制度实践、从精英倡导到民间践行的广泛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实践路径，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古代生态保护的法律与制度雏形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生态保护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古代统治者的生态治理智慧。早在西周时期，官方就设立了“虞衡”这一官职，专门负责掌管山林川泽，制定相关禁令，保护生物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条款也是屡见不鲜，如《秦律·田律》明确规定，春天二月禁止砍伐山林、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采摘刚发芽的植物，堪称中国最早的“环保法”之一。包括《唐律疏议》《大明律》等在内的历代法典中，也均有对破坏山林、稼穡、水源等行为的惩处条款。这些制度律令虽服务于当时的统治秩序，但客观上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农业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在治理层面的初步体现。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然而，受制于时代与认知的局限，这些思想大多停留在哲学思辨、道德劝诫和零散实践的层面，未能形成一套应对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高强度生态危机的系统性、科学性方案。历史的重任，交给了能够继承其精神并赋予其新生命的时代思想。

二、破与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相结合，立足中国当下实际，创造性地实现了当代中国生态思想的发展和飞跃。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动力源于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生态实际与党肩负着的宏大历史使命。这一转化绝非简单的概念移植和形而上学式的机械拼接，而是一场基于魂脉契合的深刻重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发挥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先进性，遵循理论和实践发展逻辑，用唯物史观动态考察历史、辨明文化糟粕和精华，同时运用辩证法这一伟大工具，“破”“立”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破”的是传统思

想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模糊性、被动性和零散性，“立”的是传统生态智慧的核心理念，并为之注入科学的精确性、实践的主动性和系统的整体性。这是一个“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升华过程。例如，它将“天人合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方略；将“节用”思想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范式革命。这一转化的本质，是使传统生态智慧摆脱历史局限性，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获得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

（一）转化之基：立足新时代的生态国情与全球视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首要基础，是对我国当下生态国情的深刻把握与强烈的问题意识，以肩负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担当开展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源消耗强度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大气雾霾笼罩、河流黑臭浑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更演变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自然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注定不能长远，这笔“生态账”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大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欠账”意识和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深切关怀，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动因。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优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应这一时代呼唤和人民需要，满足人民对蓝天白云、清水绿岸的迫切期待，成为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践落脚点。

这一转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立足于全球生态治理的宏大视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地球逐渐演变为一个“地球村”，国家和地区成为“村民”的单元存在，生态危机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历来负责任的大国，基于对全世界各民族命运的体察和关怀，迫切需要探索出一条超越传统工业化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新路，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关乎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存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着重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的观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种宏大的人类史观和超越民族的历史担当，也侧面要求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既是对内解决自身发展难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外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和深刻思考。

（二）转化之径：赋予传统智慧新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在发展和生存的现实需要驱动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深入的扬弃与升华。首先，它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创造性地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我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引领和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一论述摒弃了传统思想中机械的、被动适应的部分，以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为依据，科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将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节用思想，历史性升华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绿水青山”代表着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金山银山”代表着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节用”观在约束消费上的局限性，深刻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催生新的业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价值论和发展路径上实现了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再次，它将“仁爱万物”“万物一体”的伦理观战略性拓展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生态观。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要素是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因此，生态治理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对传统整体观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最后，它将零散的、依附于封建皇权的环保律令，革命性发展为“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构建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生态补偿制、河湖长制、林长制等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制度相继建立并持续发挥强大威力，生态文明建设驶入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了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一系列“创造性转化”，传统生态智慧抛却了其历史局限性，被注入了科学的基因、时代的血液和实践的灵魂，从而获得了指导当代中国伟大绿色变革的强大力量。

三、承与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如果说“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对传统要素的现代化改造，那“创新性发展”则实现了全局性的理论超越与体系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经过转化的传统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了有机融合，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核心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核心路径与动力，“生命共同体”是根本方法论，最严格的法治是坚实保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全球视野。这五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论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性创新，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思想向成熟科学形态的飞跃，不仅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基础，更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难题贡献了兼具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的中国方案。

（一）理论创新：构建系统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卓越理论贡献，在于它彻底超越了传统生态智慧的零散性和朴素性，首次构建起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各个观点的简单堆砌，而是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核心要义，从价值理念、系统思维、制度保障和全球视野等多个维度展开的有机整体。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将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结合起来，破除了“先发展还是先保护”的争论，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将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统一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延续的千年大计，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引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立足我国幅员辽阔、地貌多样的地理实际，提供了认识和处理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论，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思想，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硬约束和刚性保障，确保了生态文明理念能够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这一理论体系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具备高度的综合性与开放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非封闭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它深刻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精华，继承并发展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探索成果，同时批判吸收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进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对其中生态智慧进行了科学的升华与再造，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最终，这一思想体系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实践指导力和国际感召力。

（二）实践创新：指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变革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更引领了中华民族存续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一实践创新首要体现在顶层设计的重塑上，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美丽中国”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这一宏伟蓝图指引下，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得以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高悬，推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环保不下河”的体制机制障碍。

实践创新的广度与深度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绿色转型上。在路径选择上，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步走向协调。在制度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生态补偿制、环保信用评价制、河湖长制和林长制等创新制度全面实施，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放眼全球视野，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郑重提出“双碳”目标，成功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些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更是引领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行动指南。

四、价值与启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双创”的历程，其深远价值在于引发了一场发展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伟大革命。在理论上，它首先卓越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生态领域的重大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重塑了传统智慧的哲学基础，又用中华文明生态智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成为“两个结合”的典范。其次，它极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证明了古老智慧在解决当代难题时的独特价值，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实践上，它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优美生态环境作为基本民生；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克服短视行为，坚持久久为功；必须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这些从伟大实践中总结的启示，不仅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范式。

（一）理论价值：融合与超越的智慧之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首要理论价值，在于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度融合，开辟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这一思想并非简单的理论拼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科学的提炼、改造和升华。它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哲学基础上对“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进行重塑，从朴素直观体验上升为建立在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基础上的科学理性认识；同时，它又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生态智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使其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种深度融合，既克服了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又避免了西方生态理论脱离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谈保护的弊端，真正实现了“两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生态理论建构中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

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还体现在其对全球生态治理话语体系的超越与贡献。它以其系统性、前瞻性和实践性，超越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界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也超越了“深绿”与“浅绿”之争，提出了一条兼顾保护与发展、平衡当代发展与后代需求的辩证道路。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根本上破除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传统思维定式，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和理论范式。同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将全球生态治理提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感召力。

（二）实践启示：迈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更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方向性的实践启示。启示首先在于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落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上，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导向，以环境质量的切实改善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深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雾霾、黑臭水体、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攻坚克难，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果。

至关重要的另一项实践启示是，必须始终保持持续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定力，探索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现代化新路。生态环境改善是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绝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动摇决心、放宽要求、重走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咬紧牙关，保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与此同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结出的丰硕果实。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和科学的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思想形成过程，绝非简单的“复古”或“嫁接”，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的理

论革命和实践创新。

它从传统中走来，却超越了传统；它回应时代之问，又引领未来之路。它使“天人合一”的古老生态智慧获得了科学的时代内涵，使“取之有度”的朴素道理升华为绿色发展的全新路径，使“万物一体”的哲学思辨转化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方略，使零散的环保律令发展成为最严格的法治保障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必将对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继续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态必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105.

[3][5]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5,31.

[4][6]张景,张松辉译注.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1:114,174.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Relation to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ou xu¹

¹Party School of Songbei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shares a profound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This thought systematically inherits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such as "the 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Dao follows the way of nature." Rooted in the need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it has catalyzed the contemporary awakening of ecological wisdo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ered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encompassing values, systematic concept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drive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